

杜 甫 詩 選

馮 至 編 選

浦江清 吳天五合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3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626 字數142,000 開本787×1092 $\frac{1}{32}$ 印張9 $\frac{3}{16}$ 插頁2

1956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7年7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數65001—105000冊

定價(7) 0.56元

前言

杜甫是我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詩人裏的一個，他的作品是我們文學遺產中最寶貴的一部分。他生活在第八世紀，現在距離他的死年已經有一千一百八十多年，在這長久的時間內他的詩始終聯繫着廣泛的讀者，對於後代的詩歌發生巨大影響，對於人民起着積極的教育作用。

他發展了詩經和漢魏樂府以來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寫出時代的矛盾，採取了鮮明的進步立場。他的詩內容是豐富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因此他成為後代詩人的楷模；凡是他居住過的地方，自從南宋以來，都有碑銘或祠堂之類的建築來紀念他；他被人稱為詩聖，他的詩被人稱為詩史。

杜甫的詩流傳下來的約一千四百餘篇。現在選在這裏的二百六十餘首，僅及全部作品中的百分之十九弱。這一部分詩能代表杜甫全部的創作嗎？我們回答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希望讀者能夠從這部選集裏讀到杜詩裏最主要的部分，並且進一步認識他的詩人

的道路；他怎樣在他的詩裏反映了他所處的變化劇烈的時代，他怎樣對祖國和人民懷有無限的熱愛，他怎樣勤苦地從事創作，而成爲我國文學史上最傑出的一個古典現實主義者。

杜甫生於七二二年，死於七七〇年。他降生時，唐帝國正發展到一個經濟繁榮時期，他死時國內社會秩序紊亂，外族不斷入侵，人民過着難以忍受的困苦生活。在那繁榮時期，由於一百多年的國內統一，勞動力充足，許多荒地墾爲良田，公私儲糧豐富，米一斛或絹一匹值錢不過二百。商業和手工業發達，水陸交通便利，城市也興盛起來。通往西域的大道上商旅不絕，南海有從大食、天竺開來的商船，東海有日本遣派來的僧侶。中國文化和外國文化互相交流，工藝、美術、音樂、舞蹈都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七五四年是唐代人口最多的一年，據戶部統計各郡縣人口的數目將及五千三百萬。

衰落的時期又是什麼景象呢？在七六四年各郡縣的人口只剩下一千六百九十餘萬，十年的時間內人口減少了十分之七。勞動力減少，良田生遍荊棘，米價每斛、絹價每匹都升到萬錢左右。安史之亂，從七五五年十一月安祿山在范陽叛變到七六三年正月史朝義兵敗自殺，整整延續了七年零三個月，遭受騷擾的區域遍及現在的河北、河南、山東、

山西、陝西數省。隨後江南和西蜀到處都有軍閥的叛亂和小規模的農民起義，這情形直到杜甫死時都沒有停息。西北和西南有兩個佔有廣大領土的新興的民族：回紇和吐蕃。回紇即維吾爾族，吐蕃即藏族，他們現在是我們的兄弟民族，和我們共同生活在和樂的民族大家庭裏，但當時和唐朝彼此保持和平的時候很少，却長期處在互相敵對的狀態。

在這急劇變化的時代裏，唐代的統治階級是什麼情況，我們也需要提一提。在杜甫降生的那一年，唐睿宗（李旦）傳位給玄宗（李隆基）。玄宗初年，還能勵精圖治，培養良好政風，社會繁榮，形成歷史上所謂的「開元之治」。可是在他作皇帝的期間內，邊疆上不斷有戰爭，一方面由於吐蕃等族勢力的膨脹，一方面也由於玄宗具有開拓邊疆的野心，不願與鄰邦和平相處。最初如抵禦吐蕃，平定契丹與滅東突厥，尙能獲得勝利，但自從七五〇年以後，無論東北對於契丹，西南對於南詔，西方對於蔥嶺外的大食，都是每戰皆敗。打敗了，就需要補充兵額，人民負擔着極大的征役痛苦。同時玄宗作了三十多年的皇帝，看着府庫豐滿，倉廩充實，覺得天下的財富取不盡，用不完，他和他的統治集團的生活也漸趨腐化。他奪取了他的兒子李瑁的妃子楊玉環，封爲貴妃。貴妃和她的兄弟姊妹仰仗帝王的勢力儘量享用從民間搜刮得來的財富，建築華麗的第宅，衣着飲食都窮奢極慾，車馬儀仗也各出新奇。他們絲毫沒有覺到，長年的用兵會使勞動力減少，

農村生產下降；他們也意味不到，這樣沒有止境的大量消耗已遠遠超過人民負擔的能力。又加以水旱相繼，釀成七五四年的關中大饑。所謂太平盛世，這時只不過像是一個果實的空殼，其中的果肉與漿汁早已乾枯了。

七五五年，安祿山率領着他主要是胡人組成的隊伍在河北起兵，縱橫中原，洛陽、長安相繼淪陷。玄宗逃往西蜀，他的兒子李亨（肅宗）在靈武即位，把郭子儀的朔方軍作為基本的反攻隊伍，後來雖然配合着回紇派來的援軍，收復兩京，但是國家元氣，已傷耗殆盡。政府開支，無法維持，七五八年以後，一再鑄造『一當十』、『一當五十』的錢幣，造成唐代立國以來不曾有過的通貨膨脹。但是無論人力、物力，都要從人民中間榨取，壯丁沒有了，老人和兒童也被官吏們抓去，趕上前綫，糧租交不出，身邊的用具都被征去作為抵償。在這樣情形下，中央政府不但還要維持它的空架子，點綴太平，而且玄宗舊臣與肅宗朝廷的新貴中間還時常互相摩擦，不能合作；各地方的節度使也各自佔據一方，作威作福，不顧全局，無限度地吸取人民的血汗。

這是杜甫時代一般的情況。經濟從繁榮到衰落，政府從中央集權到對地方失却統治力量，社會從安定到紊亂，軍事從勝利到失敗，都是逐漸形成的，但是這些情形發生突變的轉捩點是在安史之亂爆發的那一年，七五五年，這時杜甫四十四歲。現在我們能够

讀到的杜甫的詩十之八九是這一年以後寫成的，其中大部分都豐富而深刻地反映了他的時代。

在談到他的詩以前，我們先看一看他的同時代的幾個詩人。

我們一向把李白和杜甫並稱。李白生於七〇一年，比杜甫大十一歲，死於七六二年，比杜甫早死八年。和杜甫相反，他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寫於七五五年以前。他雖然也經歷了安史之亂，但安史之亂對於他的影響沒有像對於杜甫那樣深刻，因為七五五年以後七年的歲月他都是在江南度過的。所以他的詩裏反映的主要是經濟繁榮時代健康的豪邁的精神。那時由於商業發達，商品交易的關係增加，社會上往往產生些不平的事，使遊俠的風氣盛行一時，許多通都大邑成爲俠客們馳騁的場所。還有一些知識分子不滿於平庸的生活，想用煉丹和修道來超脫塵俗，追求自我的解放。遊俠和求仙便成爲一時的風尚，這也是李白詩中的兩個重要的主題。此外他對於他的時代也抱有無限的關懷，反抗世俗，有時甚於杜甫；至於安史之亂在他的詩裏沒有留下像在杜甫詩裏那樣多的痕跡，主要是由於時間和地點的限制。

當時因爲邊疆上不斷有戰爭，從軍邊塞也成爲這時代詩歌中的一個主題，詩人們在

塞北和西域發現了新的世界，對着風沙瀰天的曠野發出悲壯的或蒼涼的歌聲。李白和早期的王維（七〇一——七六一）都寫過一些不朽的、歌詠邊塞的詩。但不憑藉臆想、有更多體驗的邊塞詩人要算杜甫的朋友高適（七〇二？——七六五）和岑參（七一五——七七〇）。因為他們有較長的時間在邊疆的幕府裏工作，他們所寫的邊塞是親身經歷的。但是安史亂後，他們都回到國內，高適身居要職，岑參也過着一連串的官吏生活，邊塞詩成爲他們過去的作品，而眼前人民的困苦也沒有能够引起他們的注意。

至於一些歌詠山林與田園生活的詩人如晚年的王維、儲光羲（七〇七——七五九？）等，他們的詩大都脫離了時代，社會的變動很難在裏邊得到多少反映。

我們可以這樣說，杜甫同時代重要詩人的主要作品，多半是在安史之亂以前完成的，它們的現實性在於反映了富庶時代生氣勃勃的、健壯的精神，安史之亂以後，他們的創作都進入末期。杜甫却和他們相反，他的作品裏反映的正是從繁榮到衰落以及衰落社會中的種種矛盾。

杜甫有三十多年之久生活在繁榮富庶的社會裏，從二十歲起，他在江南和山東度過將近十年的裘馬清狂的生活。那時期內他不是沒有寫過詩，却都沒有流傳下來，現在我們能够讀到的他的最早的詩是他三十歲左右時寫的。這少數的早期的詩，是對於壯麗的

自然與動物中馬與鷹的歌詠，同時也帶有當時的豪邁的風格。他自從七四六年到了長安以後，本來希圖通過政府中當權者的推荐得到一個官職，不料在長安一年一年地住下去，官職不能到手，而自己的生活却日漸貧困。這也正是唐代的社會漸漸從繁榮趨向衰落的時期。他住在長安城南，走遍長安的近郊和坊巷，看見統治階級的豪華生活日出新奇，而人民的生活却日見降低，致使貧富的懸殊一天比一天加強。他面對這些現實，他的創作態度起了變化：他關懷到國家的前途、人民的困苦，他寫出『登慈恩寺塔』、『兵車行』、『麗人行』等詩篇，在前一首裏還隱約其詞，用比喻的方法，表示他對於時代的憂慮，在後二首裏就是直接的訴苦和毫不容情的揭發了。到了唐代歷史轉捩點的七五五年，杜甫寫出來無論對於他的詩或是對於唐代社會都有劃時代意義的名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從此杜甫的詩便和他同時代的詩人們的詩劃了一個界限：他們表現了繁榮時期豪放的精神，杜甫却起始敘述時代的艱難、國家的危機、人民顛沛流離的生活。我們並不能因為杜甫有這樣的成就，而貶低其他的詩人們，尤其不應貶低對於李白的評價。這些人之所以沒有和杜甫一樣向前進了一步，是由於時代限制了他們，因為除了岑參外，他們都比杜甫早生了十年左右；是由於地位限制了他們，因為除了李白以外，他們後來都成

爲政府中重要的或較爲重要的官吏。——當時也有在創作方法和態度上和杜甫相近的詩人，如元結（七二三—七七二）和他的朋友們，但是他們的才力遠遠趕不上杜甫。

杜甫是一個政治性最强的詩人。他實際的政治生活却非常短促：他在七五六年的春天在率府裏管了幾個月的兵甲器仗，從七五年五月到七五年六月在肅宗身邊作了一年的左拾遺，隨後在華州作過不到一年的司功，七六年六月到次年正月初在成都嚴武的節度使署中作了半年參謀，一共算起來，還不滿三年，並且這都是不關重要的職位。但他自從七四六年到長安一直到他臨死的前夕，他時時刻刻都在關懷國家，關懷人民。在他剛到長安時，他說他要『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裏還多少摻雜着一些誇大的心情。在七五五年『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中所說的『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已經完全是爲人民着想了。這心情他始終沒有改變過，他晚年在夔州也是『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直到他死前最後的一首詩，寫得悽慘而悲涼，其中還是念念不忘『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

這精神貫串了他二十多年的創作生活。他拿這種態度來觀看現實，來寫詩，他的詩的內容自然會豐富起來，給唐代的詩歌開闢了廣大的國土。我們幾乎可以說，當時政治

上，社會上的許多變動，杜甫的詩沒有接觸不到的。

在安史之亂以前，杜甫已經注意到社會民生，寫出像『兵車行』、『麗人行』那樣的詩篇，但多半是客觀的敘述。安史亂後，他對於許多事物有了逐漸加深的體會。潼關失守後，他曾經參加流亡者的隊伍，在風雨和饑寒中前進；他曾經在淪陷了的長安，親眼看着胡人屠殺搶掠，使壯麗的京都變成一座死城；他曾經躲避胡人的耳目，隻身由間道逃出長安；他曾經在洛陽道上看見一些老翁老嫗，征夫怨婦在官吏的橫征暴斂下是怎樣斷絕了生路；後來無論是在隴右，在蜀中，或是在荊湘，他的目光始終沒有離開過喪亂中的人民。他雖然沒有長期實際參與政治，但他對於政治上的許多問題，都表達了他自己的意見。他困居淪陷的長安，隨時都在注意敵人勢力的消長，長安附近的戰爭，以及蘆子關地勢的重要；他在鳳翔任左拾遺，曾經不顧一切，疏救房琯；他對於借用回紇外援，抱有無限的隱憂；對於肅宗朝廷的濫賜官爵與點綴太平給以沉痛的指責；後來他到了秦州，又深切地感到吐蕃的威脅；他晚年寄居西蜀，流浪荆湘，一方面不滿意地方官吏作威作福的生活，另一方面時時刻刻都在懷念中央，關於內政、外交他都提出許多意見。吐蕃攻陷長安以及各地的變亂都在他的詩裏得到反應，至於官軍收復河南河北、河北節度使入朝和吐蕃敗退等消息都使他唱出興奮而快樂的高歌。

他的詩不但寫了他的時代的社會和政治，而且也描畫了他親身經歷的祖國一部分的山川。陝北的路程、入蜀的山道、成都的花木、川北的山水、夔州的風土，都在他的詩裏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這些描寫自然的詩沒有一首是從想像、從抽象的概念出發的，都是他親眼看到的、雙足走過的。因此每一首詩都有它的特色，在讀者面前，陝北的山與川北的山迥然不同，成都的江和夔州的江也不是一樣形勢。所以杜甫的詩不只被人稱為『詩史』，而且也被人稱為『圖經』，使我們感到，只有熱愛祖國的人才能把他祖國壯麗而優美的山川寫得這樣真實、親切。

他對於藝術懷有無限的愛好。從杜甫的詩裏我們可以瞭解不少當時繪畫發展的情形，名畫家如吳道玄、曹霸、韓幹、韋偃、王宰等人的壁畫、山水障、畫鷹、畫馬……都引起他的注意，他都給他們一定的評價。此外如公孫大娘的舞蹈、李龜年的歌曲，也由於杜甫的歌詠，使我們認識到唐代音樂和舞蹈的高度水平。

杜詩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杜甫運用了他那時所有的詩的一切形式；這些形式對他不曾有過任何限制，相反的，他使每個形式在他手裏都得到新的發展，發揮它最大的功能。他在五言古詩裏善於記載個人的流亡、艱險的行程、社會中的一些現象、人民的生活以及許多富有戲劇性的言談動作；他寫得是那樣生動，我們讀了，感到的不是五言的拘

東，而是語調的自然，其中最顯著的例子是『羌村』、『三吏』、『三別』、『遭田父飲美嚴中丞』等詩。他在七言古詩裏最長於抒寫他豪放的或是沉痛的情感，以及對於時代和政治的意見，如『悲陳陶』、『悲青坂』、『洗兵馬』、『同谷七歌』都可以代表。五律、七律，在唐代詩人中很少有人能超越了他，他深厚的感情在五律中得到凝鍊，在七律中得到充分的發揮，『春望』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是最好的說明。絕句，從數目上看杜甫寫得不多，但他和當時的絕句名家如王昌齡、王之渙等人相比，也沒有遜色。成爲問題的是那些長篇的五言排律，杜甫用這形式主要是投贈權貴，或是寄給遠方的友人，有一定的組織，好像是代替信札，這形式在杜甫手中雖然得到大的發展，有的長到一千字，但由於裏邊往往堆砌着過多的典故，掩蓋了豐富的情感，不能說都是成功的作品。所以這類的詩我們選的最少。總之，一般說來，杜甫的詩是高度地達到了內容和形式的統一。

杜甫在五古、七古，甚至在一部分的律詩裏大量地提煉了人民的語言。他敘述人民的生活，抒寫人民的情感，只有用極自然的語言才能表達出來。所以我們讀這一類的詩，格外感到親切，它們把散文裏所能達到的語調的自然，完美無缺地溶鑄在整齊的詩句裏。另一方面，他也沿用了大量的古語，這些古語自從六朝以來就生存在詩歌裏，沒有僵化，到了杜甫手裏，更獲得了新的生命。此外方言、俗語，以及民間流傳的諺語，也常

常被杜甫點化爲詩中的警句，如『前出塞』裏『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就是很顯著的例子。

杜甫的詩有這樣偉大的成就，無論是內容或形式都給中國的詩歌擴大了領域，這是和他愛人民、愛祖國的熱情與從中產生的矛盾分不開的。他出生於一個官僚家庭，家族親戚都屬於統治階級，這樣的家庭在社會中享有特權，不服兵役，不納租稅。他在四十四歲以前，個人的生活和社會情況都還沒有發生多大變化，所以這時他的詩和當時一般的詩並沒有多大分別，也就是沒有超過他的階級給他限定的範圍。這時他感到的矛盾只是當時作爲一個知識分子內心裏常常有的一種矛盾：在城市裏從事政治生活呢，還是在山林中度自由的歲月？他個人的要求以及家庭的傳統都促使他在長安獲得一個官職，同時他親自看到過李白豪放的生活，也聽到過孟浩然的行徑，在他官職求不到手時，對於那些在江湖間過着自由生活的人們自然起些向往的心。他在長安初期，他常常感到這種心理的衝突，就是在他四十歲以後，在他寫『赴奉先縣詠懷』時，他還很痛切地提到過。但是在這種矛盾中間，從事政治的心總是居於主要的地位。

他四十歲以後，個人的生活日漸貧困，社會的繁榮也逐漸衰落，他才通過個人的饑

寒看見人民的痛苦。當他的目光轉向人民時，他一方面認識到統治階級的腐化，一方面想到自己雖然貧困，在社會中還是享有許多特權，若是和那些被兵役和租稅壓得無法生存的人們相比，他個人的痛苦究竟還是可以坦當的。在他認識到統治階級的腐化時，他毫無顧慮地揭發他們腐化的生活，在他想到自己還是屬於特權的享用者時，他的思想提高了；他無論是面對着剛剛餓死的幼兒，或是從隴入蜀在極端艱險的途中，他的悲哀都不會停在自己身上，都擴展到比他更苦的人民。所以他的茅屋爲秋風所破，下了一夜雨，滿屋漏得沒有一塊乾淨的地方時，他也曾希望有廣廈千萬間，好使無處安身的人們有了住所，一旦在他眼前出現了這樣的房屋，他自己就是凍死也甘心。這時愛人民的心超過了個人的怨訴。

同時，國家又遭受到極大的危機，隨着安史之亂的爆發是回紇的驕橫、吐蕃的入侵，以及各地方小軍閥的驕奢淫逸。杜甫這時感到國家的危機比人民的痛苦更爲重要。

怎樣才能挽救國家的危機呢？他只有把一切希望寄託在皇帝身上。他希望皇帝善於運用國內存在着的力量，迅速平復安史之亂，他希望不要過於依靠回紇的外援，他希望對待吐蕃要採取和平政策，他希望那些割據地方的軍閥們把皇帝當作皇帝看待，他希望當前的皇帝能有唐太宗那樣英明。但是他對之抱有無限希望的皇帝，在國難時期，既不

能抵禦外侮，也不把人民放在心上，只是想盡方法維持自己的地位與特權，他們對於强悍的外族不惜委屈求全，反過來更是毫無限制地向人民搜刮物資，亂征兵役。他們並不能解除災難，反而增添災難，並不能減輕人民的痛苦，反而加重他們的痛苦。杜甫究竟是一個官僚家庭出身、受儒家影響很深的人，他對於皇帝只有時而歌頌，時而規勸，時而諷喻，他不可能進一步否定這封建社會的體系和皇帝的地位。在這中間他感到極大的矛盾：若是強調人民在征役和賦稅上感受的痛苦，就無法抵禦胡人；但他面對着人民所受的統治者的壓制與胡人的摧殘，又不能閉上眼睛不看，保持靜默。這矛盾的心情在『三吏』、『三別』中表現得最爲明顯。在洛陽的路上他看見一羣不成丁的孩子、子孫都在戰場死盡的老人、剛結婚一宵的青年，都被征入軍中，官吏們對這些人的殘酷無情，使人難以忍受。杜甫若是不念及國家的危機，他很可以像寫『兵車行』一樣直接敘述他們的痛苦，但他不能這樣，他念及國家的危機，不得不對他們說些勉勵和安慰的話。只是『石壕吏』裏的老嫗，景況太淒慘了，勉勵和安慰都無從說起，他只好以一個見證人的身份把當時的景象描述出來，在千千萬萬後代的讀者的面前對殘暴的統治者提出嚴正的控訴。

這個矛盾他始終無法解決，這也就是他所能發展到的最高點，把這矛盾反映得最尖銳的詩歌往往是他最成功的作品。此後他寄居西蜀，流浪荊湘，都沒有能够更進一步超

越過這個最高點。他看見人民的痛苦，只是希望皇帝減輕租稅，疏遠小人。但是這個希望是徒然的，絲毫不能解決當時的問題，致使他晚年有許多詩句流於感傷，含有不少斷念的情緒。雖然如此，他却不曾取任何一個方式，逃避現實，像我們前邊提到的，直到他最後一首詩，他還念念不忘國家的不幸。

這部詩選就是希望讀者能够從這些詩中體會到杜甫在他的時代裏所具有的進步性，這進步性是十分寶貴的，它使杜甫繼承了中國詩歌中從詩經、楚辭、漢魏樂府以來的最優良的現實主義傳統，並且發揚了這個傳統。

馮 至

寫於一九五二年秋，
一九五六年春修改。